

广州市大佛寺
岭南佛教文化研究院

普觉文化系列丛书 之二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ND BUDDHISM COMMUNICATION

海上交通 与佛教传播

主编 ◎ 龚 隽
顾问 ◎ 耀 智 副主编 ◎ 江 泓



宗教文化出版社

广州市大佛寺
岭南佛教文化研究院

普觉文化系列丛书 之二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ND BUDDHISM COMMUNICATION

海上交通 与佛教传播

• 主编 ◎ 龚 隽
顾问 ◎ 耀 智 副主编 ◎ 江 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交通与佛教传播 / 龚隽主编.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88-0499-3

I. ①海… II. ①龚… III. ①佛教—传播—历史—中国—文集 IV. ①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6278 号

海上交通与佛教传播

主编 龚隽 副主编 江泓 顾问 耀智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 (发行部) 64095265 (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贺 兵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 19.75 印张 350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499-3

定 价: 68.00 元

序

学术与宗教虽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界域与规则，而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则作为学术的佛学与作为宗教的佛法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而相得益彰的。学术与宗教各自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相互协作，这对于双方的发展都有着加成的作用。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2015年下半年，中山大学哲学系与广州大佛寺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旨在共同推动广州地区佛教学术与佛教弘传事业朝着高格调与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大佛寺也正式成为中山大学哲学系佛学研究教学的基地之一。这一合作很快就分别从讲学、论坛、会议与出版等多方面积极地开展起来。可以说，这一年多的合作是愉快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所取得的成果也令人满意，并在社会各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2016年1月12-16日，中山大学哲学系与大佛寺联合主办的“海上交通与佛教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这一合作的成果之一。此次会议，我们邀请了来自海内外重要的佛教学与亚洲学的学者与法师济济一堂，共同就中国历史上的海上交通与佛教传播之关系进行了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探讨，会议论议精彩不绝，许多议题的讨论可谓开风气之先。于是，我们决定将这次会议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分享给教、学两界。

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中国大致可分为陆路与海路两系，而佛教学研究的重心大都放在陆路一系，虽然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曾经呼吁重视海传佛教一系之研究，而相对来说，海传佛教的研究仍然稍显薄弱，并未引起教、学两界应有的重视。这无论对于中国佛教史或是亚洲佛教史的研究来说，无疑都是一

种严重的缺陷。纵观中国佛教的历史，自古佛教随海上丝路传到中国的一脉，曾经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形成产生过深入的影响，而到了近代，又有中国的高僧大德，如太虚大师等力图从海路把汉传佛教的法流反哺传播到东南亚各地，这一佛教在海上输入与传出的历史现象，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去咀嚼与研究反思的。而近来国际学界有关“海洋佛教”（marine Buddhism）观念的提出与研究的兴起，也可以说正因应了这一要求，我们非常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相关成果不断问世。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传佛教的重镇，今天我们在广州举办这样一个具有高水平海传佛教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与学术意义，也饱含了重要的现实价值。这部会议文集的出版可以说是众缘和会，多方合力的条件下所生产出的知识成果。作为这部文集的主编，我首先要特别感谢大佛寺方丈耀智法师的热心支持，同时也感谢诸位参会学者、法师愿意以他们的智慧成果来共襄盛举。而中山大学中文系书记于海燕（原哲学系书记）女士、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中心特约研究员江泓女士为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付出了大量心血，我当铭记于心，并特致谢忱。

龚隽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2017年9月于羊城

目
录

序	龚 隽 1
古代交州于中印佛教传播的地理位置与文化关系	黄国清 1
Guangzhou And Its Role In Elite Buddhism During The Maritime Routes Of The Six Dynasties.	Dr.Dhammadīpa Sak 16
海陆丝绸路上的佛教传播特性及其异同略析.....	唐忠毛 41
海洋佛教及其文化特征与信仰方式.....	李向平 52
关于《善见律毗婆沙》的翻译与流传的几个问题.....	吴蔚琳 71
真谛三藏与正量部	圣 凯 88
古代南海的观音信仰	王琛发 100
现代化叙事中的临济以及《临济录》：一种方法论的省察	何燕生 121
从“一苇渡江”到“一苇渡海”	白照杰 139

沉香的海华交融与中国禅香的创造	赖贤宗 164
《续高僧传》在日本的流传	池丽梅 182
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两国佛教文化交流	魏志江 195
试论扶南与南朝的佛教艺术交流	姚崇新 207
日本佛教民俗学管窥	王晓葵 234
镜中花：爪哇佛教汉文资料再检讨（一）	宣 方 248
东南亚海上交通现代化与华人佛教转型	于 飞 邓子美 256
Three Forms of Buddhism: Original, Theravada, and Mahayana as Different Flowers Growing in Different Lands and Times	Somparn Promta 288

古代交州于中印佛教传播的 地理位置与文化关系

黄国清 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

一、前 言

古代交州的地理范围最初涵盖今日中国南方广东、广西与越南北部的区域，三国时代开始分立交、广二州，交州的辖区主要是越南之地，至唐代改隶安南都护府，10世纪中叶之后脱离中国而独立建国。越南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今日东南亚与东亚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西海道往来的停泊重镇，西来海船可经此继续航向中国港口，或上岸转陆路前往中国内地，中国人前往南海或印度亦可反向走这条路线，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古代越南的北、中、南部曾分属三个国家，北部长期受中国统治，称为交趾（交趾）、交州、安南等，于968年由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是由越南人统治的国家；中部为古占婆（Champa）王国；南部为古扶南（Funan）王国（后称真腊）的一部分。越南北部在公元前3世纪至10世纪一直隶属中国的郡县，该地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除了汉地传统的儒道两家文化，还有中国僧侣从陆路南上传入的大乘佛教；另一方面，印度僧人也经由海道来到交州，传入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整体而言，交州地区佛教的传播以中国所传大乘佛教占主导地位，也流传自海道东来的印度声闻乘与大乘佛教。^①

古代印度僧人东来弘经与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有西北陆路与南方海路二条主要

^① 参见梁志明等：《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187、226-229页。

干道。^①陆路经由西域前往印度，海路历经南海诸国抵狮子国，再进入印度内陆。陆路或海路两条路线同样充满危险，走陆路必须穿越险峻的高山与广垠的沙漠，但商旅络绎往来，且有西域这个佛教重镇作为中继站，多数中印僧人选择了这条路线。走海路的优点是不必艰苦徒步跋涉，但须要寻觅大型海运船舶，依赖每半年转向的信风，还要面对不可测知的海上危难，仍然多有僧人怀抱着弘法与求法的深切志愿踏上旅途，特别是在西北陆路交通阻断的时期。佛教在印度不同地区有多元化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样貌的呈现，从海道往还中印与西北陆路所经过的国家不同，接触到的佛教派别有所别异，经由南方海路传到中国的佛教展现何种形式与内容以及具备何种特色，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西北陆路的佛教传播情形已获得学界的广泛研究与讨论，而南方海路佛教传播的探讨显得相对不足，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方面的贡献仍有待当代研究者的持续发掘与呈现。关于取道海路的来华印僧与求法汉僧，何方耀的研究在冯承钧、梁启超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就晋唐时期的历史资料做出全面与详细的梳理，并已进行佛典传译之基本情况的归纳与分析。^②萧丽华对唐朝僧侣往来安南的传法活动有详细的研究。^③其他尚有学者针对六朝往来海路僧人及汉代至南北朝交州佛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④这些资料对研究者了解海路佛教传播帮助甚大，本文在相关研究所提供的历史文献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的探索，将焦点凝聚于交州这个地区，采用明确言及“交址”与“交州”的史料，析论交州的佛典翻译与佛教传播情形；寓居或取道交州之中印僧人对佛教文化传播所起的贡献；以及这些僧人所传佛教典籍与修持风范的特点何在。

二、交州的地理沿革与佛教的早期传播

中国自古即与越南相往来，《尚书》《墨子》《吕氏春秋》《大戴礼》《淮南子》

① 另有从滇缅往印度一路，较少为中印僧人所利用。

② 参见何方耀：《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特别是第1章“晋唐南海道佛僧的群体考察”及第6章“晋唐海路佛僧的经典传译活动”。

③ 参见萧丽华：《唐朝僧侣往来安南的传法活动之研究》，收于《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第18期，2011年，第189-218页。

④ 参见石云涛：《六朝时经海路往来的僧人及其佛经译介》，《许昌学院学报》，第31卷第6期，2012年，第76-82页；及何劲松：《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交州佛教及其同中原佛教的关系》，收于《中国佛教学术论典》，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第50册，A394-413。

《史记》等古代典籍多所记载。^①如《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言：“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张守节《正义》说：“趾音止，交州也。”又《五帝本纪·帝尧》：“申命羲叔，居南交。”^②司马贞《索隐》言：“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举一字名地，南交则是交趾不疑也。”另外，《五帝本纪·帝舜》言：“定九州岛，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③就此可窥见古代中越交通与关系发展的线索。

中国正式将越南纳入地理版图，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裴骃《集解》引韦昭说象郡为“今日南”，^④即是越南之地。秦朝灭亡时，原南海尉赵佗割据岭南，并吞象郡，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设交州刺史，设置九郡，其中有三郡在今越南境内，即交趾（今河内一代，旧称北圻）、九真（今越南清化、义安、河静三省）、日南（今为广南之南，平定富安等七省，旧称中圻）。汉代之交州，实指今日广东、广西与越南北部之地。吴孙权黄武五年（226）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分合浦以北属广州，交州与广州始分为两州。不久复旧，后于永安七年（264）又分交、广二州。一直到唐高宗调露元年（679）改隶交州为安南都护府，而有安南之名。安南都护府统13州，其中原属交州管辖范围者包括交州（原交趾郡）、爱州（原九真郡）、驩州（原日南郡）等地。北宋初年建立由越南人统治的国家。明代永乐五年（1407）曾短期平定越南，设置交趾布政使司，纳入版图20余年。^⑤

交州位处中国南方边陲，身居中国文化中心地带的人士将其视为文化落后的偏远地域，古代以“荒炎”“徼外”言之；随着当地的开通教化与文化升级，仍有“道路悠远，山川险阻”的问题，官员违法违纪或触怒主上可能被贬谪交州。例如，《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说：“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

① 参见陈玉龙：《历代中越交通里考》，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东南亚史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123页。

② 此段系引述《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

③ 以上帝颛顼、帝尧、帝舜资料分见（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12、16-17、43页。

④ 见（汉）司马迁：《史记》，第253页。

⑤ 参见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①虞翻冒犯主上遭远谪交州，像他这种上层文士流徙到交州，反有助于提升当地的文学水平。《新唐书·列传·杜正伦传》说他因为得罪皇帝而“出为谷州刺史，再贬交州都督。”^②又如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因自己犯罪而连累老父遭贬官为交址令，《旧唐书·文苑上·王勃传》说：“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畴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址令。上元二年，勃往交址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③王勃为了去交址探望父亲，结果溺死在南海，结束一生的短暂生命。就地理位置与文化水平而言，交州在中国上层社会人士眼中都属边缘地带。

即便是在中国佛教圈中，法师犯过也有被流放交州的例子。《高僧传》卷7“义解篇”有高僧释道渊的传记，最后提及他的弟子释慧琳“为性傲诞，颇自矜伐”，后来因“著《白黑论》，乖于佛理，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著《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颜延之及宗炳捡驳二论，各万余言。琳既自毁其法，被斥交州。”^④慧琳因言论与著作严重违背佛理而遭流徙交州以作为惩戒。又《高僧传·释僧瑾传》中提到高僧释智斌曾代昙岳为僧正，刘宋义嘉之乱时，智斌遭人谗言说他为义嘉修法祈福，于是被槟黜到交州。^⑤《续高僧传·释灵润传》说到一位僧人因事被皇帝下令还俗，后来值遇下诏度僧的机会，又想出家，几位大德连名推举而获得剃度。皇帝得知这件事，下诏痛责，将这些僧人都贬斥到驩州（原日南郡）^⑥，大家要离开京城时都非常难过，只有灵润泰然自若。^⑦交州对于当时的中国佛教界而言，同样属于偏远地区。

尽管如此，从中印佛教传播的视角来看，交州因位居佛教海道传播的要站，其佛教文化发展拥有特殊机缘。冯承钧引伯希和之言概括说：“当纪元1世纪时，

①（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321页。

②（宋）欧阳修等传，《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038页。

③（后晋）刘昫等撰：《新校本旧唐书》，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第5005页。

④见《大正藏》第50册，第369页上。

⑤见《大正藏》第50册，第373页上。

⑥《一切经音义》卷93言：“驩州，上音欢，《郡国志》云：驩州，今交州安南管也。”（《大正藏》第54册，第894页中）

⑦《续高僧传》卷15，《大正藏》第50册，第546页中。

云南及缅甸之通道，2 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166 年大秦帝安敦之使臣，即由交州登陆。3 世纪初年译经建业之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址。226 年大秦人秦论所抵之地亦为交址。255 或 256 年所出《法华三昧经》，亦在交址翻译。2 世纪末年黄巾之乱，独交州差安，中国学者避难于其地者，为数不少。观其种族信仰之杂，与夫商业之盛，有所纪录，自亦为意中必有之事。”冯氏更将南海的交址比拟作西域的于阗，以彰显交址的地理重要性。^①交州因其海陆交通的要冲位置，形成中印文化的交会地带，其地所接收的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或许比不上东土与西域的本土文化中心，但两种文化的交流激荡，有利于文化的创新与融合。再者，印度佛教文化亦有经由交州而传至中国者，就这种情形而言，交州比起中国有处于较上游的意义。特别是在佛教初传中国的时期，西域与交州的佛教文化可能相较中原地区为先进。

佛经在汉地的翻译肇始于东汉，由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来到洛阳译出禅数学与般若学的高深专业经典，经论佛法是在一群对此种修学方法感到兴趣的小众之间传播，尚未及于上层社会。其后又有佛传故事与本生故事这类适应大众取向的经典译出，有利于佛教的扩大传播。^②到了三国时期，佛教教势有很大的拓展，昙柯迦罗于曹魏嘉平年间（249-254）来华是个重要事件，他译出《僧祇戒心》，更礼请梵僧前来建立羯磨法，这是汉地出家受戒的起点。中国佛教史传的最早出家记录是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出学道为沙门”之事。^③在此之前，汉地虽有人自行剃发为僧人形貌，但并无受戒的事实。^④此事对比出当时交址佛教传自海路的受戒羯磨制度或许早于中国建立。从南方来吴地的康僧会，其先人世居印度，父亲因经商而移居交址，他在十余岁时父母双亡之后出家，在交址修学三藏佛典，并博通世间学问，于吴帝孙权赤乌十年（247）来到建业，营造茅屋，设置佛像而修行佛道。因其神异事迹而受到吴帝敬重，为他建造佛塔和寺院，这是当地有佛寺之始，所以取名“建初寺”，称当地为“佛陀里”。^⑤其实支谦早从北

① 参见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影印第 1 版，第 8-9 页。

② 参见 E. Zürcher,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 in K. Shinohara and G. Schopen, ed. *From Banares to Beijing: Essays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Honour of Prof. Jan Yun-hua*. Oakville: Mosaic, 1994, pp. 277-304.

③ 参见《出三藏记集》卷 7《放光经记》言：“惟昔大魏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学道为沙门。”（《大正藏》第 55 册，第 47 页下）《历代三宝记》卷 3 亦于“甘露五年”条下说：“颍川朱士行，最先出家，即汉地沙门之始也。”（《大正藏》第 49 册，第 37 页上）

④ 参见《高僧传·昙柯迦罗传》，《大正藏》第 50 册，第 324 页下-第 325 页上。

⑤ 参见《出三藏记集》卷 13《康僧会传》，《大正藏》第 55 册，第 96 页中-第 97 页上。

方避难进入吴国，于黄武到建兴年间（222-253）翻译了许多经典^①，何以当地仍未建有佛寺？可能因支谦是居士身份，不具住持寺院的正当性。康僧会在吴国译出《吴品经》《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经典，第一经因已佚失而内容不详，古德有说即是《小品般若》，^②第二经属佛本生故事，第三经是警世因果故事，这些应是康僧会从交趾携来的流通经典。康僧会来到汉地后，更向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三贤学习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并协助陈慧注释此经，反映出这种专业禅经他在交趾之时并无机会学到。

另一位活动于汉末三国时期与交州有关的佛教人物是牟子，据《弘明集》卷1《牟子理惑论》（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说此书主人翁本居苍梧（今广西梧州），因汉末天下扰攘而带着母亲避世交趾，在当地常以五经质难道教神仙术士。他在二十六岁时回到苍梧娶妻，虽受到太守、州牧的器重，邀请担任吏员，但无意仕进，而锐志于佛学，兼研《老子》，通达儒释道三家，因当时许多人批评他背弃五经而转向异道，于是撰写《理惑论》，站在佛教立场而论述三家一致的道理。^③关于《理惑论》一书的真伪与成书年代，学者之间争议颇大，据序传所说“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此焉”，与《史记》和《三国志》所载有吻合之处。《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记载当时交州太守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理惑论》可以说出当时一些人物史事，又知悉因处于军阀割据时局，带兵经零陵、桂阳往豫章，必然引发沿途州郡的疑虑，要有人充当使者说客，能够反映汉末三国时代的地理历史情况。^④由书中将“交州”与“交趾”等同，撰写时间当在交、广二州分立之后。重要的是作者的地缘关系，他在二十六岁前于交趾学习儒家经学，后来在苍梧深入佛教与道家的教说，由于东吴佛法尚属初传阶段，这个地区的佛教应非由北方的中国传来，较有可能是从南方海路传入。根据书中所述佛教观点来看，当时交趾的佛学已具备一定基础。牟子在一个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汇融的区域，立基于佛教优位的视角，率先提出三教融合的主张。

① 参见《出三藏记集》卷13《支谦传》，《大正藏》第55册，第97页中—下。

② 《吴品经》并未存世，（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5言：“《吴品经》五卷（即是《小品般若》，见《三藏集记》。）”（《大正藏》第49册，第59页上）《吴品经》是否即是《小品般若》，仍有待考证。

③ 参见《大正藏》第52册，第1页中。

④ 参见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卷上，第11-12页；另见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册，第225-231页。

其他有关三国时期佛教在交州的传播资料,《历代三宝记》卷5载:“法华三昧经六部(一本有‘正’字。佑云失译)右一部六卷,高贵乡公世,甘露元年七月,外国沙门支疆梁接,魏言正无畏,于交州译,沙门道声笔受。佑云失译。房检及见竺道祖《魏世录》及《始兴录》。若依交州及《始兴录》,地应入吴录。今据平及魏录收附此。”^①僧祐《出三藏记集》卷4“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将这部“法华三昧经一卷”判为失译经^②,费长房所处的时代在他之后,反而知道是由支疆梁接在交州所译,而且僧祐记为一卷,长房记为六卷,其间不无疑义,可能非同一本。然而,费长房有其资料依据,指出曹魏甘露元年(265)有外国沙门在交州译出六卷本的《法华三昧经》。另外,《出三藏记集》卷4“条新撰目录阙经”载有“法华光瑞菩萨现寿经三卷”,^③唐代僧详《法华传记》卷1说:“法华光瑞菩萨现瑞经三卷,沙门支强梁于交州译。”^④应是涉上文《历代三宝记》“法华三昧经”之说而误植作者,此本在《历代三宝记》载为“古旧二录失译诸经”。^⑤如果费长房所据数据无误,支疆梁接是交址最早有记录的外国译师。

以上就康僧会与牟子的弘教事迹与佛教观念来看,交址的出家受戒制度可能早于中国成立,应由海路传来。然而,就通行的佛教教义来看,交址佛教在基本佛教学说与佛传故事方面已建立稳固基础,而由西北陆路传到中国的禅学这类高深法门可能在当地还不易学到,康僧会是到吴国后才向安世高的后传弟子们学习。

三、交州相关的佛经翻译与弘化因缘

以上已就迄于三国时代的交址佛教传播情形有所论析,从晋朝到唐朝,中印高僧假道海路经交州往来两国,或是来华译经弘法,或是去印求法学道,变得频繁起来,历史文献记载渐多。下文分为译经与弘化两个面向进行探讨。

① 见《大正藏》第49页,第56页下。

② 参见《大正藏》第55页,第30页中。

③ 参见《大正藏》第55册,第32页上。

④ 参见《大正藏》第51册,第52页下。

⑤ 参见《历代三宝记》卷5,《大正藏》第49页,第60页中、第61页中。

（一）交州与佛教经典的汉译因缘

经由海道来华的译经僧人主要以中国都城为目的地，交州是作为入境港口或中继港口；而前往印度求法的汉僧，也可能选择到交州出海。据《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记载，东晋西凉州人释智严（350—427），西行到罽宾求法，积极礼请高僧佛驮跋陀罗（359—429）到东土弘化，得到跋陀罗的应允。经过三年的陆行跋涉，渡过葱岭，经历六国，抵达交址，才改由海路，最后从青州东莱郡（今山东莱州）上岸。佛驮跋陀罗在中国弘法与教导禅修多年，直到义熙十四年（418）才开始在建康道场寺翻译佛经，译出六十卷《华严经》《观佛三昧海经》等以及与法显合译《摩诃僧祇律》《大般涅槃经》。^①他们走的这条路线较为特殊，是先经陆路由印度到交州，再坐船从今日的山东上岸。此事尚存疑点，书写早于《高僧传》的《出三藏记集》卷14〈佛驮跋陀罗〉本传说：“会沙门智严至西域，遂请俱东，于是杖锡跋涉，经历三年，路由雪山，备极艰阻，既而中路附舶，循海而行。”^②又同书卷15〈释智严传〉说他“志欲广求经法，遂周流西域，进到罽宾，遇禅师佛驮跋陀，志欲传法中国，乃竭诚要请。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踰涉雪山，寒苦峻绝，饮冰茹木，频于危殆，绵历数载，方达关中。”^③说到他们翻越雪山，改走一条不同以往僧人经西域往中国的路线，到达有港口之处，乘船来到汉地。就地理位置来看，这个港口是交址的可能性非常高，慧皎也应不致无本而说。

刘宋时来华的求那跋摩是罽宾王的旁支后代，年十五出家成为沙弥，受具足戒后，能诵经百余万言，又深明戒律。三十岁时，罽宾王逝世，没有后嗣继位，众人商议立他为王，跋摩于是远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后到南海阇婆国（今爪哇），广行教化，阇婆王为他建立精舍，敬事为师。宋文帝听闻他的高风，于元嘉元年（424）命令交州刺史奉旨去迎请跋摩，京城名僧慧严、慧观等人也附寄书信表达敬重之心，并修书给阇婆王以求顺利延请跋摩。阇婆王既然视他为师，经过一段长久时间仍不放行，然而，跋摩志愿游历中国，不肯留下，自行随着商人船舶来到广州。后于元嘉八年（431）抵达建邺，敕住祇园寺，开讲《法华经》与《十地经》。所译佛教典籍包括《菩萨善戒经》《四分律比丘尼羯磨》

① 参见《大正藏》第50册，第334页中—下。

② 见《大正藏》第55册，第103页下。

③ 见《大正藏》第55册，第103页下。

《优婆塞五戒相经》《杂阿毗昙心论》等。^①宋文帝根据地理位置命令交州刺史派船迎请跋摩，可惜阁婆王不肯放他前来，后来跋摩搭乘商人海舶抵达广州，交州没有机缘迎请到这位印度高僧过境传经与弘教。

来自罽宾的昙摩耶舍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抵达广州，住白沙寺，有徒众 85 人。他长于“毗婆沙律”，也就是锡兰上座部所传的戒律。有清信女张普明向他咨受佛法，耶舍为她讲说佛陀出生因缘，并为她译出《差摩经》一卷。耶舍后于义熙年间（405—418）到长安，与天竺沙门昙摩掘多一起译出《舍利弗阿毗昙》。至刘宋元嘉年中（424—453）辞还西域，不知所终。有印度人竺婆勒，久在广州经商，于南康郡生下一子，后来此子跟随耶舍出家，法号为法度，通晓梵文与汉语，常为耶舍翻译。^②《出三藏记集》卷 5 特为法度书写一篇〈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批评他说：“天竺科轨非其所谙，但性存矫异，欲以摄物，故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读诵。反抄着衣，以此为法；常用铜钵，无别应器。乃令诸尼作镇肩衣，似尼师坛，缝之为囊，恒着肩上，而不用坐，以表众异；每至出路，相捉而行。布萨悔过，但伏地相向，而不胡跪。法度善闲汉言，至授戒先作胡语，不令汉知。”宋故丹阳尹之女宣业寺尼法弘、交州刺史张牧之女弘光寺尼普明等，都信受他的教法。^③其实，法度遵从其师耶舍所传锡兰上座部的声闻戒法，僧祐站在大乘立场批判他“小乘迷学”“造异仪”是有点言之太过。其中，张普明是交州刺史张牧的女儿，也曾向耶舍问法，耶舍还特别为她翻译了一卷《差摩经》，后来从耶舍弟子法度修学声闻佛教。^④张牧于刘宋永光元年（465）任交州刺史^⑤，死于泰始初年（466），交址人李长仁就杀害张牧从北方带来的部队，据交州叛变。^⑥张牧之女很早就在广州向昙摩耶舍学法，后在广州出家依止法度修学，张牧可能由广州前往交州就任，以佛教为其家族信仰。

释若那跋陀罗，华言智贤，南海波凌（亦曰诃凌，于今爪哇）国人，善于佛教三藏。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有成都沙门会宁想要前往天竺观礼圣迹，

① 参见《高僧传·求那跋摩传》，《大正藏》第 50 页，第 340 页上—341 页中。

② 参见《高僧传·昙摩耶舍传》，《大正藏》第 50 页，第 329 页中—下。

③ 参见《大正藏》第 55 册，第 41 页上。

④ 有学者说此经对应于《杂阿含》103 经，经中述说差摩比丘病重，上座比丘们通过陀婆比丘为其说法宽解之事。参见石云涛，《六朝时经海路往来的僧人及其佛经译介》。

⑤ 见《宋书·本纪·前废帝》，第 143 页。

⑥ 见《南齐书·列传·蛮传》，第 1017 页。

乘坐海船西游，路经波凌国，与智贤同译《涅槃经》后分二卷。这本是从《阿笈摩经》（《阿含经》）内译出，讲述世尊圆寂后毗荼收取舍利等事，与大乘《大般涅槃经》内容不太相关。经典译完后会宁派遣弟子送往交州，自己才继续前往印度的旅程。至仪凤元年（676），交州都督梁难敌派使者与会宁弟子运期到京城奉表进经，仪凤三年（678）大慈恩寺沙门灵会于东宫启请流通此经。^①这部《涅槃经》较为特殊，属于初期佛法系统，相当于《长阿含经》中的《游行经》，述说释尊圆寂前后的事迹，南传佛教是收在《长部》（Dīgha Nikāya），经名《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bbāna-sūtra）。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有会宁的传记，提及会宁就是因为这本与大乘《涅槃经》不同，希望使其在中国流传，才派遣弟子运送到交州。^②

（二）交州与中印法师的弘化因缘

交州是个佛教兴盛的地区，除了中印法师往来路经此地，交州本地许多法师也前往南海和印度寻求佛法。《高僧传》“神异篇”记载耆域是位修行道高，行踪莫测，颇有灵异事迹的天竺僧人，他从印度出发抵达扶南（今柬埔寨与越南南部），顺着海滨游化，最后到达交广地区。他在晋惠帝（290-307 在位）末年来到洛阳，批评中国佛教衣着过于奢华，不合佛教素朴精神。后因洛阳战乱，欲辞还天竺，众人请其开示，他说：“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说完便保持禅默。因为所说内容太过简单，众人以为他并没真正开示，耆域又说：“八岁虽诵，百岁不行，诵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虽少，行者益多也。”耆域确实是位深通修行之道的高人。后来不知所终。^③

隋代三论宗的实际创宗者吉藏，俗姓安，先祖是安息国人，其祖父辈为了避仇而移居南海，居住于交广之间，后来迁居金陵，吉藏就在此地诞生。吉藏家族历世奉佛，父亲后来出家法名道谅，其精进修行情形如下：“精勤自拔，苦节少伦，乞食、听法以为常业。每日持盃将还，跣足入塔，遍献佛像，然后分施，方始进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应食众生，然后远弃。其笃谨之行，

① 参见《宋高僧传·释若那跋陀罗传》，《大正藏》第50册，第717页中-下。

② 参见《大正藏》第51册，第4页上。

③ 参见《高僧传·耆域传》，《大正藏》第50册，第388页上-下。